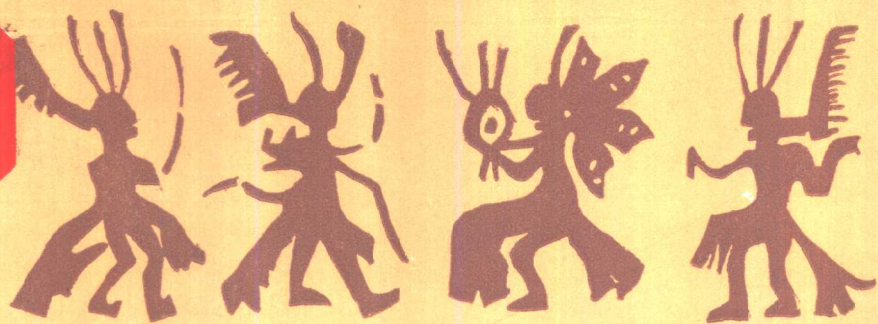


姚漢榮 著

楚文化尋繹



楚文化寻绎

姚汉荣 姚益心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傅劲德

封面设计：钱丽明

楚文化寻绎

姚汉荣 姚益心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3,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册

ISBN 7-80510-499-9/I.177

定价3.20元

目 录

一	先楚族源考·····	1
二	南国诗人屈原思想探源·····	24
三	屈原创作心理初探·····	41
四	南楚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	56
五	南北诗风比较·····	90
六	说南国奇文《天问》·····	121
七	考古学楚文化·····	153
八	南楚文化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192
九	楚辞研究小史·····	212
十	评“屈原否定论”·····	228
后	记·····	253

一 先楚族源考

(一)

一种文化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歷史现象，而必然有其源远流长的过程。要研究楚文化，也必须首先弄清它的起源问题。然而，要搞清楚文化的起源，还遇到一个额外问题，这就是楚民族的族源问题，因为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所以，考绎楚民族的族源，便成了我们这本小册子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就我国学术界来说，探讨楚民族族源问题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50多年来，众说纷纭，其观点大致有三：

一是北来说。北来说是一种传统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先生们认为，楚人本是祝融的子孙，他们同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是华夏族的一支后裔。先楚民族原本居住中土，后来因某种原因南下江汉，遂衍变为后来的楚民族。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傅斯年、张荫麟、徐旭生等先生。傅斯年先生在1930年写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说：“楚之先世‘景员维河’，实中原之旧族，经三代而南迁”，“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傅文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张荫麟先生在40

多年前写的《中国史纲(上古篇)》中说：楚王族“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因“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高阳氏族或部落也属于华夏集团，却与东夷集团有很深的关系，祝融氏族或部落的一部分后来虽然南下苗蛮集团，成了那边的宗教和政治首长，可是氏族或部落本身仍属于华夏集团，它的大部分也仍留在本集团中，并未南下。”因而，从楚人的族属源流来看，中原地区与楚的关系确实是十分密切的。

在传统观点中还有一种西来说，此说的代表是姜亮夫先生和岑仲勉先生。姜亮夫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夏殷民族考》一文中提出了“楚为夏后说”。40多年后，他又先后在《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历史学》1979年第4期)和《楚辞今绎讲录》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姜先生说：“夏起西方……楚为夏后，盖亦以为西方民族也。”“屈作中不少地方写到西方……因为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岑仲勉先生在1949年发表的《楚为东方民族辨》中力主楚自西来。他认为颛顼、重黎、祝融皆“西方族类”或“西方之人物”，那么作为颛顼、祝融后代的楚民族，便当然是自西而南的西来部族。他们并认为楚人的远祖黄帝，本来也是居住在昆仑山系的黄河源头之上，即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同青海相接的地区。楚人直系至亲季连氏这一族，诸书皆云“芈”姓，芈读弥，为羊声，自与西方之羌族有关。后随昆吾氏一起迁许(今许昌)，又由河南东部地区的黄河流域，迁徙到了湖北中部的江汉平原。

这些先生们虽主张楚自西来，但是，他们的主要论点则

和北来说相同：认为楚民族是夏民族的一个分支。所以，可作为北来说的一个补充，归入传统观点之中。

二是东来说。这是目前学术界中同北来说双峰对峙的一种重要观点。主此说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胡厚宣、王玉哲、顾铁符等先生。顾铁符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楚国民族述略》一书中从颍项原属古代东方少皞族系和祝融八姓的地望分析着手，得出了“祝融集团，包括楚在内，原来是东夷，不过较早就进入中原”的结论。顾先生这一结论，源于郭沫若、胡厚宣两位先生。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提出了“楚本蛮夷，亦即淮夷”的观点。以后又在他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著作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解》中之‘熊盈族’，‘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继郭沫若先生以后，胡厚宣先生1934年写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他在此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楚原与夷、徐同为东方民族，后来南迁江汉流域。他说：“楚之始祖为祝融，自金文考之，知祝融即陆终……自古籍考之，知祝融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固皆为东方之民族也。《左传》之楚丘，当为楚之废墟，而一为卫地，一在曹县东南，亦皆东方之地也。楚称‘伯父昆吾’，而昆吾在卫，亦在东方。周代东夷之叛，其中有楚，周伐东夷，楚亦在内……金文中伐楚伯在奄，而奄在鲁曲阜之地。知楚之必在东方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向压迫，及黄河流域气候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

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1950年王玉哲先生又在《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一文中重申了胡先生的观点，并进而从考证祝融八姓、陆终六子的地望入手，推证“楚族最初当起于河南中部。大约在商末始东迁江苏北部。到周的初年，再从江苏北部南迁于江苏安徽间的大江流域。又经过了四、五代，到熊渠时（周夷王时）才开始沿长江西上，停留于江汉之间”。

近年来更有同志从楚文化中对神鸟凤凰图腾的崇拜从而得出凤鸟图腾“只能来自东方”，所以楚民族是一个来自东方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古老民族。在商代，荆楚地区并不包括楚人。楚即淮夷、与东夷少昊氏集团关系很深，楚之先民实居淮水下游。武庚叛乱中，参加反围的“熊、盈十有七国”，就有楚人的“熊国”在内。楚人战败后，溯江西上，到达沮漳流域，成为江汉地区的“新”居民。

三是土著说。土著说的观点几乎是同东来说同时产生的。早在1936年，林惠祥先生就在他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提出了“大抵荆楚原为南方民族，至少自殷中叶即奠居江汉之荆山一带”的观点。以后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也主张楚是南方的一支蛮族。近年来竭力论证楚为三苗后裔的有俞伟超、龙海清、龙文玉等人。俞伟超先生在《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从古籍考证重黎为南方的部落，而三苗是重黎的另一支重要后裔，他们的先世都汇合于黎氏。俞先生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早在四十年代，徐炳昶先生已指出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如作进一步考察，又知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①（载《文物》1980年第10期）龙海清、龙文玉在《屈原族别初

探》一文中比较了现今苗族和古代楚族在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相同相近点，肯定了屈原“是一个苗族出身的诗人”，“屈原的作品说明他是尚未完全汉化的苗族”，“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的后代。”（龙文刊《学术月刊》1981年第七期）

在先楚族属渊源的考辨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分歧的看法。这一方面说明了科学研究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它需要时间和积累，需要艰苦卓绝的劳动，在客观上它总是包括了一个由微而著，由分歧而渐趋统一的历史过程。何况，楚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了多种部族因子，这就给先楚族属的研究带来了种种迷惑人的假象，使本来属于人类历史朦胧期的先楚族源更为扑朔迷离。另外，还因为人们在对“族源”这一概念涵指的理解有分歧，或者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把应该属于“流”的楚民族因子误认为“源”，或者扩大了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把民族文化等同于民族族源，因此使研究工作走上弯路。

（二）

下面，我们想就先楚族源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意见。

俞伟超先生的《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是近年来楚、苗同源说的代表性文章。俞文所据资料，主要是如下三条：

夫荆子熊严……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国语·郑语》）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

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国语·楚语下》）

颛项生骺头，骺头生苗民，苗民釐姓。（《山海经·大荒北经》）

俞伟超先生根据第一条资料，作出了第一个推论：重黎为楚族始祖；根据二、三两条资料，作出了第二个推论：三苗由黎氏发展而来，他们和楚族一样同属黎姓。然后又根据这两个推论，作出了楚、苗同源出于重黎的结论。但是，细审上述引用材料的文义，再核之以先秦典籍中的有关材料，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推论，特别是最后的结论，是很可以进一步商榷的②。

第一，三苗并非从九黎发展而来。三苗从黎氏发展而来之说，早在两汉就已开其端，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就下过这样的断语：“苗民即九黎之后”（《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郑玄语）。三国的韦昭，也说过同样的话：“三苗，九黎之后”（《国语·楚语下》注）。但是，在此之前，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孔安国就说过：“三苗非九黎之子孙”（《礼记·缁衣》孔颖达疏引孔安国语）。《尚书·孔传》是一部伪书，所以孔颖达所引孔安国语似不足信。然而，我们如果撇开孔安国、郑玄、韦昭这些经学家的注文不顾，而细审《尚书》、《国语》文义，就可以发现，郑玄虽被后人视为经学大师，但他的这个“苗民即九黎之后”之说是颇为牵强的，而被视作伪书的《尚书·孔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却是颇有道理的。

《尚书·吕刑》多次出现“苗民”，而竟无一处提及“九黎”，因此，人们根本无法根据《吕刑》作出“苗民即九黎之后”的结论。勉强可以把“苗民”同“九黎”牵合在一起的材料仅仅只有

《国语·楚语下》(见上引)。然而,《国语》文意是极其清楚的,它是说:到了少皞的末年,九黎胡作妄为,社会的一切正常秩序,都给他们搞乱了……,后来,三苗又象九黎那样胡作非为,扰乱社会秩序。这里的“其后”,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性词组,只能解释为“从那以后”,而不能解释成“他们的后裔”。因此,韦昭将其解释成“三苗,九黎之后”,实在是一种附会之说。

第二,鼂姓的苗民也不是楚祖重黎。不错,《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过“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鼂姓”这样的说法。在古代鼂、黎也确实可以通假,所以“鼂姓”可以说就是“黎姓”。但这“黎姓”的苗民并不就是楚祖重黎。众所周知,这楚祖重黎就是那名震遐迩的祝融,这在上面所引述的《国语·郑语》中是说得清楚的:“黎为高辛氏火正,……名之曰祝融。”但在《山海经》中,这鼂姓的苗民与祝融却显系二人。在《山海经》中,“黎姓”的苗民,是颛顼的子孙,而祝融则是炎帝的后裔。《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可见,这鼂姓的苗民,和号称祝融的楚祖重黎,完全是不同谱系中的人物,是决不能把他们“合二而一”的。

其实,《山海经》中的史料,里面固然不乏古史的影子,但是它毕竟只是神话,可信程度是不大的。就拿上面所提到的那两条材料来说,我看都未必可信:祝融不会是炎帝的子孙,颛顼也不可能是三苗的祖先。因为三苗是活动在长江流域的南方部落。《战国策·魏策一》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总之,其活动

地区大体在今天的湘、鄂、皖之交的长江两岸。而颛顼和祝融呢？则显然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北方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春秋战国时代的郑，即今天河南省的新郑县。那时的卫，即今河南省的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还有一座颛顼城，相传为颛顼所居之地。新郑、濮阳，相距咫尺。由此可见，颛顼、祝融和三苗是分属于两个不同地域、不同谱系的部族，而颛顼和祝融之间，从他们活动地域的相近看，倒确有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

第三，楚祖重黎和所谓苗祖黎氏，不仅不是同一人物，而且是互相敌对的人物。俞伟超先生根据《国语·楚语下》“三苗复九黎之德”这句话，认为三苗是从九黎发展而来的，而且认为这九黎就是楚祖重黎，应该说，作出这样的推论是很粗心的。因为《国语·楚语下》在“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这句话的前面，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很显然，这里的九黎，是作乱者，就是他们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弄得民神杂糅；而重、黎呢，则是受命恢复民神不杂的正常社会秩序的英雄人物。在这里，九黎是叛乱者，而重、黎却是这次讨伐和平息九黎叛乱事件的主角。重、黎和九黎，完全是矛盾斗争中的对立人物，怎么能够把他们等同起来呢？如果混同英雄和叛逆者，这不仅是逻辑的混乱，于事实上更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三苗并非从九黎发展而来，所谓苗祖“黎氏”也不是楚祖重黎，他们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还是两个仇敌，因此，

楚苗同源之说也就成了建立在沙滩上的华厦，它的根基是不坚实的。

(三)

从古籍中的大量记载看，与先楚同源的，有很大可能是夏民族。《史记》在《楚世家》一开头就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而在《夏本纪》中，也是在一开头就这样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在这里，帝颛顼成了楚、夏两族的共同祖先，祖先相同，他们当然是同源的两族。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今绎讲录·天问概说》中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天问》讲历史，夏代特详，而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此在齐、鲁、三晋之书仅稍露一点痕迹，而《天问》言之甚详。为什么呢？因为楚是夏的后人，夏起自西北，而后分为两支：一支沿黄河而下……，另一支则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姜先生是楚辞研究专家。他以屈原作品为内证，得出楚、夏同源说的结论。如果我们进一步考之以古代文献，就可以更加相信司马迁和姜先生的楚、夏同源说是完全正确的。

从秦汉诸典籍记载看，可为楚、夏同源说佐证的材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1、楚、夏民族共同崇拜“熊”图腾。我们翻开《史记·楚世家》，首先便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楚民族的先祖，他们的名字都是和“熊”联在一起的：穴熊、鬻熊、熊丽、熊狂。不但这些楚族立国之前的祖先名字带上了熊，就是那个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的熊绎，他的名字也是和“熊”联在一起的，而此

后的楚国君主，他们的名字也始终是以“熊”为伴：熊艾、熊杨、熊渠、熊通、熊侣……。为什么楚君的名字都联着“熊”？熊是楚君的姓氏吗？非也，楚君芈姓，而非熊姓。熊非自己姓氏而又偏把它冠于自己名字之上，这种奇怪的现象，清楚地告诉我们：楚族是把那力大无穷的熊作为神兽崇拜的。熊，是楚族的图腾。

夏民族崇拜什么图腾？先秦古籍没有明确记载。《史记·夏本纪》为夏王朝所排的谱系中也没有以熊为名的人物，但是夏民族的始祖鲧和夏王朝的开国君主禹，他们却和熊结下了不解之缘。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

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国语·晋语八》）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天问》）

这里所引的三条材料，前两条是明确说鲧死后化为黄熊的。第三条是屈原对鲧死而复活，又化而为熊的传说所提出的问题。屈原对鲧死化熊说需要提出问题，可见此说在先秦是流传很广的。

父亲是死后化熊，儿子却活着就变化为熊。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

轘辕山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山路险阻，凡十二曲，要想凿开它是不容易的，所以禹变成熊，用力去凿山开河。

鲧是被冤杀的，死而不屈，精诚所至，化为黄熊。禹凿山开河，非人力所能，也化而为熊，以完成非人力所能的勋业。在这里，熊成了神圣和力量的象征。另外，屈原在《天问》中针对夏民族的神话还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这龙负熊的神话，在现有的先秦典籍中，仅见于《天问》。所以我们已无法窥见其究竟，但从屈原的这两句诗中，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感到：在这龙负熊以戏游的神话中，人们对这只熊是具有无比亲切感的。夏人对熊特别感到亲切，而且把它看成是自己民族始祖的精魂所化，看成自己祖先盖世功业赖以实现的神物。所有这一切，再一次告诉我们，和楚人一样，夏人也是把熊作为神兽看待，作为图腾崇拜的。

图腾崇拜是我们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原始宗教。先民们所崇拜的图腾，不仅作为该族的名称或标记，而且视为本族的祖先。因此，如果楚、夏两族共同以“熊”为图腾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话，那末，可以断言，楚、夏两族是有着共同祖先，共同血缘的。

2、楚族的先祖——夏王朝的守护神，同为部落联盟的重要首领。在楚族的远祖中，除帝颛顼之外，还有两位显赫的人物，一位就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的重黎。他“绝地天通”，建立了“光照四海”的丰功伟绩。另一位就是祝融“其后八姓”之一的昆吾。他们是楚族远祖中最受崇敬而且引以为骄傲的人物，《左传》所载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僖公二十六年》）

夔子国是隸楚同姓国，他们仅仅因为没有祭祀楚族的两

位先祖，就遭致灭国之祸，这件事本身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但它却能使人从中看到祝融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鬻熊是楚族的近祖，周文王时，他曾子事文王，有功于周，因此周成王分封功臣时才以“子男之田”分封鬻熊之后熊绎于荆楚，所以，这位鬻熊实是楚族立国过程中的奠基者。这样一位人物，理应受到子孙们的崇敬和祭祀。而祝融，这位楚族的远祖，居然也受到和鬻熊同样隆重的待遇，可见祝融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

《左传》另一条记载是讲昆吾的。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穰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昭公十二年》）

当时属于郑国的许，从前是昆吾旧地，但那是将近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了，楚灵王要把近千年前先祖的旧地收回来，当然只是图谋侵略郑国的借口而已。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隼楚的统治者，对这位远祖昆吾强盛的往昔是十分怀恋，并且是引为骄傲的。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楚族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先祖，他们却又和夏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国之将兴……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昔夏之兴也，融（韦昭注：祝融也）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上》）

“降”，自天而降也。“崇山”，即夏都近郊之崇高山。祝融在夏王朝立国之初，自天而降于京畿，观王朝盛德，为民布福。这种传说，很可能是夏民族自己编出来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在开国之初都要编出此类神话，以示这个王朝的建立是顺天应时的。问题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多的是，而夏人

为什么选择了祝融作为自己王朝和民族的守护神？这里很可能是因为夏民族把祝融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或者是有某种特殊亲密关系的人物。因为，在人们，特别是先民的心理中，自己的祖先总是特别关怀着他的子孙，为子孙保佑，为子孙降福。因此，这则传说，无疑是说明了祝融和夏民族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楚族的先祖祝融同时是夏族的守护神的传说过于虚无缥缈，那末，楚族另一先祖昆吾是夏王朝部落联盟中著名首领确是历史的真实。这在先秦典籍中记载甚多。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国语·郑语》）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

昆吾与桀同日亡。（《尚书·汤誓》孔疏引皇甫谧语）

安邑县西有鸣条陌，汤伐桀，战昆吾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

伯者，霸也。《国语》称“昆吾为夏伯”，说明昆吾在夏王朝是部落联盟中的一位力量十分强大的部落首领。《诗经·商颂·长发》是殷人歌颂商汤灭夏功勋的一首颂诗，从“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诗句看，说明昆吾和夏桀是商汤最后的劲敌，这不仅说明昆吾力量的强大，而且说明昆吾和夏桀的亲密关系。从《诗经》、《尚书》、《帝王世纪》所引的这些材料看，在对抗商汤伐夏的战斗中，昆吾和夏桀始终是站在一起的。当时，夏王朝部落联盟中的其他部落，有的被消灭了，有的倒戈了，